

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

吴 剑 杰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余年,是以清朝统治阶级“办洋务”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时期,即通常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的性质与作用的总的评价,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据此,提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的新概念。另一种意见“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近代八十年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开始便呈现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路线,一条是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路线;而洋务运动是“直接间接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这种意见不同意把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与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考察历史进步潮流对立起来,对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人们要作阶级分析,不能以抽象的“学西”和封建统治阶级办洋务来取代农民战争在近代历史上的主流作用。我认为:洋务运动从主要倾向上看,它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近代化运动,与当时正在日本实行的明治维新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方针只允许引进和学习一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反对对封建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变革,这样就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一起,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镇压了先进阶级力量为排除这种阻力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斗争,从而导致统治阶级近代化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上愈走愈远。否认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倾向,认为它是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的见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样,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是中国争取独立、进步的根本途径的论点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证明: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近代化,谋求社会进步。本文拟从以上总的评价出发,谈谈有关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

所谓洋务思想体系,是指决定和影响洋务运动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不是个别人物的个别言论。倡导和参预洋务活动的许多人或同一人,在不同场合,或针对不同问题,说过许多话,往往有不尽一致甚而互相抵牾的情况。比如奕訢说:“发捻交乘,心腹之患”,“故灭发捻为先”,表明办洋务的目的在于对内镇压;但他又说:“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表明了御外侮、雪国耻的愿望。再如李鸿章,既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无需变革;又说“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反对因循守旧。如此等等。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个别言论来把握洋务思想的实质,因为它不决定洋务运动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趋势。譬如,我们不能根据上述奕訢、李鸿章的某一句话,便认定洋

务运动的目的是对内，或对外，是变法，或是守成。洋务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规定着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归宿，影响着洋务运动的全过程。

“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最初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等维新启蒙思想家。林、魏等在民族矛盾激化和反侵略战争的刺激下，首先睁眼看世界，查夷情，办夷务，注意了解西方，并提出“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希望中国从此“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云集鸢赴地创办西方式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使“西洋之长技尽为中国之长技”，增强封建的清朝中国御敌“制夷”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思想闪光在当时条件下并没有能引起共鸣。此后二十年，清朝统治者苞苴苟安，依然故我。“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忌，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①；“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②。整个统治阶级并未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接受教训，认真地对待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稍微改变一下以天朝上国傲视“外夷”的愚顽态度。他们对时局和世势的认识，远远落在同时代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后面。当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中外往来文书务用“照会”、称“亲爱”而废弃“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天国领导人与外国人行握手礼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还在顽固坚持外国人谒见中国皇帝必须行藩邦朝觐宗主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③。谈西学，办洋务，逐渐成为一时的风尚，最大的“时务”。所谓“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王韬语）；“师远人之长”（左宗棠语）、“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曾国藩语）、“学习外国利器”（奕訢语）、“用其所长，夺其所恃”等有关办“洋务”的思想、观点，不仅反映在主持洋务活动的官僚如曾、左、李等人的奏疏言论中，而且更大量地反映在参与洋务活动的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和洋务政论家王韬等人的著作中，形成一股有声势有影响的思想潮流。

洋务思想所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以兴起并形成成为一种思想潮流，除了对林、魏“师长”思想的继承以外，直接促成和推动其兴起与形成的，是时势，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严峻局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虽然曾经给清政府带来屈辱，但外国势力尚限于沿海五口，皇帝照样可以不见外国使臣，大臣们还照样可以用“驭夷之道不外羁縻”的漂亮话来粉饰投降行径，朝野上下都还觉得清朝江山可以照旧坐下去。这是造成左宗棠所谓“自林文忠公被革后二十余载事局如故”^④的社会原因。可是，二十年后的六、七十年代，情况便不相同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持续十四年之久，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基础，最后靠了外国枪炮和人员的支持，才勉强镇压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势力由五口扩展到中国的所有沿海地区和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更直接损害了中国皇帝“天之骄子”的形象。清朝统治就这样面临着内忧外患、上下交困的严重危机。这真是中国“古今之奇变”，但并非当时的所有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这一变化的。真正认清这个变化了的现实，敢于正视现实并寻求新的出路的，是最早一批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官僚、军阀（如中央的奕訢、桂良、文祥和地方军阀曾、左、李等）、驻外使节（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以及政治嗅觉敏感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等）。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主观动机以及认识水平各有不同，但在不改变清朝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增强清朝应付内外危局的能力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

李鸿章说：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⑤；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议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⑥；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⑦；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⑧；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⑨。

奕訢说：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⑩。

曾纪泽说：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⑪

薛福成说：

“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⑫。

张德彝说：

“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⑬。

王韬说：

“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⑭；

“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矣。此时而曰徙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也。……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⑮。

从以上引述的各种代表人物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构成洋务思想体系的主要论点是：第一，认识到中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奇变”、“奇局”；造成这种“奇局”的原因是随着两次鸦片战争而来的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应当抛弃“内中国外四裔”和“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的陈腐观念。中国既不能对资本主义“闭门不纳”、“骤屏之于境外”，重复“徙戎攘夷”的迂儒空论，也不能“视若无事，动循古昔，不知变通”和“束手而不问”，应该自觉地适应“天运使然”的“宇宙之大势”，即世界新潮流。第二，处在“其势力又当全盛之际”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之下，中国要想自立和存在下去，唯有“自强”，讲求“自固自强之术”，应当承认外国有所长，以便师其之长，补己之短。第三，中国要自强自立，必须采用西法，学习制造先进武器，学习造舟车、修铁路，制造各种机器物品；稍后，还进而认为“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提出“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适当允许私人经营近代工商业，等等。

基于以上的共同认识，具有洋务思想的人们或者在朝提倡、推行，或者在野宣传、鼓吹，主张在内政方面实行有限度的改革。他们继承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体常静，用常动”的变法思想，反对“事事必拘守成法”，认为“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隐约地觉察到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必须有相应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动与之相适应。在外交方面，不少人震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迷惑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暂时“相安无事”的假像，错误地认为“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覬覦中国土地之心”，主

张在“条约已定，断然更改”的情况下，守定和议，维持现状，不轻言“启衅”，浪言“攘夷”，应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用妥协退让换得一个二十余年无战乱的所谓“中兴”局面。这种思想成为当权的洋务派官僚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当然，也有人（包括个别洋务官僚如左宗棠等）并没有放弃攘夷御外的目的，并且多少抱有卧薪尝胆的愿望。如冯桂芬说：有人认为提倡“师夷长技”便是背叛圣人之道，一味空喊“攘夷”。“夫所谓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骄之气也。居今而言攘夷，试问何具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口”。他明确主张，只有先“师夷”才能谈得上“攘夷”，只有把西方利器学到手，能造、能修、能用，中国才“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然后才“可以雪从前耻”，自强自立，“雄长瀛寰”；否则，就会“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独俄英法米之为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⑩这种以“师夷”为手段，以“攘夷”“雪耻”为目的，即所谓“用之乃所以攘之”的思想主张，是对林、魏思想的直接继承，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可惜它没有成为洋务思想的主流。

在洋务思想的指导和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清政府在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里，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拥有近代装备的陆海军，兴办了某些近代化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科学技术和技能的各类人才，翻译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书籍和某些社会政治学说，等等。这一切，都是古老的封建的中国所未有未闻的新事物、新因素，也可以说是李鸿章所希望建立的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毫无疑问，近代中国并不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新事物、新因素，便改变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滑下去的命运，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也始终没有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出“自强”的事实。也无庸讳言，洋务官僚创办军、民用工业和加强陆海军力量，包含着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目的和谋取私利的卑劣动机。这些，当然是我们今天应该谴责的，但它还不能代替对洋务运动，尤其是对洋务思想的科学评价。

应当怎样科学地评价洋务思想的历史地位呢？恩格斯有过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⑪。他指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否定剩余价值理论，这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无疑是错误的，但却反映和代表了无产阶级要求摆脱资本奴役的正义呼声。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即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却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即阶级斗争观点上看来是错误的东西，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却可能是正确的呢？奴隶制剥削的野蛮，封建制剥削的残酷，资本主义剥削的赤裸裸，从阶级斗争观点看，无疑都是应当受到诅咒和谴责的；但是有谁否认它们之间的替代创造过一个比一个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事实呢？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更仇恨更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了，但他们在愤怒谴责“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时，又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⑫。洋务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洋务运动的客观效果不能说是好的，洋务派“办洋务”的主观动机也不能说都那么纯正。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否认洋务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具有进步意义的理由。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应该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考察，判断历史的功罪，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时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是否提供了新的

东西，还要看他们是否有高出于同辈人的东西。如果历史地、辩证地评价洋务思想，它首先是受到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从阶级局限看，作为与农民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可能不首先看到农民革命对本阶级统治的严重威胁，并设法增强镇压的力量。这与他们的前辈林、魏等人在阶级矛盾上升时期所取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与他们的同代人冯桂芬、王韬等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人物和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也没有根本的区别。人们既然没有因为前者或后者对农民阶级的敌对立场或言论而否定其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同样，也没有理由因此而否认洋务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从时代局限看，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出现和形成，作为新的先进生产关系及其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只是借助洋务运动这根“杠杆”才刚刚萌发，远远没有成熟为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农民阶级发动过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已经表明，由于它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命运。这一切，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没有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人，能够提出比洋务思想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思想理论。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⑩。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地主阶级的传统思想，即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它继续封闭着国人观察世界的眼睛，仍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地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⑪；“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⑫；吹嘘中国的伦理道德是所谓“无形之巧”，外国技艺只是“有形之巧”，而“无形之巧胜于有形之巧万倍也。何必见异思迁，用夷以变夏哉！”^⑬在顽固派看来，外国人全是“鬼奴”，而中国是礼义之邦，孔门后代，人不能与“鬼”打交道，更不能去“事鬼”、“师夷”。有比较才能鉴别。与上述顽固、保守、僵死的传统思想相比较，洋务思想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异端”。其历史进步意义首先在于推动着先进的中国人继续睁眼看世界，努力认识世界并开始走向世界。正是在这种思想潮流的激荡下，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学习西方的近代化运动。虽然当时的洋务思想家们还只是把西方各国的强盛归结于技术的进步，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要使中国建立起西方那样强大的工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正是由于开始引进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才促使人们从这种新的生产力与旧的封建关系的矛盾发展中，去重新认识现实和思考未来，才唤起人们变革封建制度的政治要求。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思想家们关于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技术的呼喊，是促使封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步骤，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都必须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制约。时代和条件变化了，原来是进步的思想理论就会丧失其先进性甚至走向反面，从而被新的先进思想理论所代替。洋务思想也不例外。在中法战争以前的六、七十年代，当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条件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在冲破顽固保守思想的禁锢、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斗争中，起过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到了中法战争后的八、九十年代，当风气已开，谈论西学已不再如以往那样被诋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而是“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⑭，甚至某些顽固派对“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也表示某种程度的容忍和赞同的时代条件下，当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而是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问题时，洋务思想家坚持“中学为体”的陈旧主张，反对要求对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

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

宋 镜 明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击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后来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吴佩孚再起后为什么又能立即与张作霖结成反革命联盟?直奉军阀是如何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概述。

一

吴佩孚是在反奉运动的怒涛中,打着反奉的旗号东山再起的。

北京政变后,代替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政权的临时执政者,名义上是段祺瑞,但这时皖系的势力已瓦解,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已受排挤,实权则控制在奉系张作霖手里。奉系军阀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和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从而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因此,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告全国民众书中,号召“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①,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受奉系军阀扩张压迫的各省直系军阀,企图利用人民的反奉气势,联合起来对抗奉系,以便重振旗鼓。曾被打垮、几经周折、退往岳州(今岳阳)的吴佩孚,更是蠢蠢欲动,伺机东山再起。

并伙同顽固派共同抵制维新变法思潮的勃兴。这时,洋务思想便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的历史作用由进步走向反动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作者将另文论述。

注释:

- ①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五册,第529页。
- ② 张之洞:《劝学篇·益智》。
- ③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81页。
- ④ 《重刻〈海国图志〉叙》。
- ⑤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六册,第149页。
- ⑥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 ⑦⑧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五册,第119页。
- ⑨⑩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1页。
- ⑪ 《使西日记》,1981年版,第24页。
- ⑫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卷四。
- ⑬ 《欧美环游记》卷三。

- ⑭ 《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
- ⑮ 《弢园尺牍·答包行洲明经》。
- ⑯ 《校邠庐抗议》卷下。
- ⑰ 《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
- ⑱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 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 ⑳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
- ㉑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34页。
- ㉒ 沈纯:《西事彙测》第八,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 ㉓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